

讲古堂



# 千古大變局

影响近代中国的十一个关键人物

曾纪鑫 著

洪秀全：「天国」的实验与失败

曾国藩：天降大任的自觉担当者

李鸿章：国破山河在

张之洞：逸轨的新政

严复：弱肉强食的危机与适者生存的图强

慈禧：悲剧时代的悲剧人物

康有为：传统「乌托邦」

梁启超：「少年中国」的呼唤者

孙中山：民国之父

袁世凯：挥之不去的专制与皇权

宋教仁：走向民主的挫折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讲古堂



# 千古大變局

影响近代中国的十一个关键人物

曾纪鑫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千古大变局:影响近代中国的十一个关键人物/曾纪鑫著.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5

(讲古堂)

ISBN 978-7-5633-7467-0

I.千… II.曾… III.①中国—近代史—史料②历史人物—  
人物研究—中国—近代 IV.K253.06 K8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0791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 邮政编码:101113)

开本:787mm×1092mm-1/16

印张:22.25 字数:328千字

2008年5月第1版 200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 001~10 000 定价:32.6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目 录

楔 子:千古大变局 ..... 1

一个老迈昏聩、日薄西山、风烛残年的老大帝国,除了  
风凰涅槃、脱胎换骨、死而复生外,难道还有别的出路与选  
择吗?

洪秀全:“天国”的实验与失败 ..... 35

一位名叫洪秀全的落第书生在广州街头获得了一本传  
教士的布道读物《劝世良言》。正是这基督教的通俗册子,  
不仅改变了一个书生的命运,而且改变了大清帝国的发展  
走向,加速了它的崩溃与灭亡,甚至差点改变了一个民族的  
命运。

曾国藩:天降大任的自觉担当者 ..... 71

不得不特别提及的是,曾国藩临死前一天,还在阅读  
《理学宗传》,并写下了最后一篇日记。他死时也不像常人那  
样躺卧在床,而是端坐椅中而逝。

李鸿章:国破山河在 ..... 99

在一部百年屈辱的近代史上,李鸿章孤独而寂寞的身  
影映照在宽大的天幕前,几乎受尽了上自朝廷高官,下至普  
通百姓,来自方方面面的天底下最多的唾沫与骂名。

**张之洞：逸轨的新政** ..... 129

面对慈禧太后的沉默，洞悉清廷底蕴，善于揣摩人心，“深知西太后好恶”的张之洞感到事情极为不妙，他似乎听到了阵阵咬牙切齿与磨刀霍霍的可怕声音，看到道道杀机与股股血光直逼而来。

**严复：弱肉强食的危机与适者生存的图强** ..... 151

林纾所能担当的，仅仅是一个翻译家的角色而已。“药治不了的，用铁。铁治不了的，用火。”只有严复，才将西学变成了照亮古老中国沉沉黑夜的冲天火炬。

**慈禧：悲剧时代的悲剧人物** ..... 173

颇有趣味的是，慈禧留下的遗命，其中一条却是“以后勿再使妇女预闻国政，此与本朝家法有违”。

**康有为：传统“乌托邦”** ..... 203

康有为一个最大的失误，就在于不懂得中国黑暗的官场学，看不到事情的实质，抓不住问题的关键。他以为只需打动光绪皇帝，改革大业就可一帆风顺了。

**梁启超：“少年中国”的呼唤者** ..... 229

当任公先生全盛时代，广大社会俱感受到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导。其势力之普遍，为其前后同时任何人物——如康有为、严几道、章太炎、章行严、陈独秀、胡适之，等等——所赶不及。

**孙中山：民国之父** ..... 251

提及功名，我们不得不特别指出的是，作为一名学贯中西的饱学之士，孙中山可能是中国近代史上唯一没有陷入科举怪圈的人物。他没有参加过一次科考，就连这样的念头也不曾有过。

**袁世凯：挥之不去的专制与皇权** ..... 283

正是从他编练的新军中，走出了四位民国总统（袁世凯、冯国璋、徐世昌、曹锟），六位民国总理或陆军总长（段祺瑞、王士珍、段芝贵、唐绍仪、张怀芝、靳云鹏），还有三十四位督军，这不能不说是袁世凯的功劳，也是他创造的一个不大不小的近代奇迹。

**宋教仁：走向民主的挫折** ..... 317

由直接杀手、间接杀手、幕后杀手、真正杀手等一系列大的小的、明的暗的、有形的无形的、伪善的狰狞的杀手们所组成的庞大的杀手集团，杀死的不仅仅是宋教仁个人，而是中国的民主政治！

**跋：历史的杠杆** ..... 341

以洪秀全、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严复、慈禧、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袁世凯、宋教仁等近代关键性历史人物为载体，兼及林则徐、魏源、徐继畲、郭嵩焘，从而探究、剖析、描述、反思中国近代历史的方方面面。



暴风骤雨就要来了,可屋内的人浑然不觉。满屋子的人,自古以来曾经“出产”过那么多号称通天达灵、先知先觉的巫仙神怪,却没有一人产生哪怕一星半点的预感。真的没有,一个也没有!

由多子多福之家、三世同堂之家,到家族宗族之家、家国同构之家,经家庭而家族到国家,最终形成“家天下”的大一统模式——一间伸张无际的“屋子”,一个庞大无比的“家国”,便是囊括一切的“天下”了。“天不变,道亦不变。”尽管“天下”之人一代又一代,后浪推前浪生生不息,却始终依照固定不变的模式,循着一以贯之的轨道,保持从容不迫的淡定。不知不觉间,几千年的光阴就这样转瞬即逝。几千年啊,什么天灾人祸、惊涛骇浪、艰难险阻、坎坷挫折没有经历过?可大家就这么过来了,不仅过得挺好,而且形成绵延不绝的悠久历史与熠熠生辉的灿烂文化。因此,安之若素、泰然处之、游刃有余、傲视天下不仅是一种自我陶醉的天朝心态,也是一种自适自足的理想境界。“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什么都不必担心,不必忧虑,不必张皇,后人循着前人的足迹,前人依着先人的传统,先人傍着古人的经验,尽管走下去就是了。哪怕少有的“先天下之忧而忧”,也并非当下人们视野里的忧患意识,并非追寻美好的社会制度,探索理想的发展之路,以超越历史与传统,而是如何求取“居庙堂之高”与“处江湖之远”的为官从政之道,如何保持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平衡、稳定与和谐,如何因循过去的推力与惯性维护旧有的传统范式……

然而,“狼”来了,说来就来,来得那样迅猛凌厉,出人意料!

昔日之“狼”,源于边关陆地——西南不足虑,只要防着铁骑奔突、为患最烈的北狄西戎即可。

而今之“狼”,却来自大海,乘着高大的铁甲坚船,由东南沿海奔袭而来。漫漫千里海岸,军力有限,捉襟见肘,防不胜防;即使布阵对垒,八旗绿营使用的大刀长矛,怎能抵挡英军洋枪洋炮?原始与现代抗衡,过去的经验不灵了,传统的模式不行了,几千年不变的“天”说变就变,刹那间乌云密布狂风劲吹飞沙走石。而“道”呢?“道”一下子失却根基,突然间眼花缭乱莫名其妙找不着北……



是的，而今之“狼”初来乍到之时，从上到下，谁也不知其本性与厉害。

事情得从道光十八年(1838年)说起。

其时，古老的中华帝国已进入封建末世，一股衰朽的气息弥漫开来，深入、渗透于社会的内在肌理。而表面呈现的，仍是平安无事，一片祥和。道光皇帝并非像此后某些书中描写的那样乏善可陈，集邪恶与昏聩于一身。他虽然平平庸庸，无甚大才，但也算得上忠于职守，勤勉有加。道光的执政总原则就是守成——守住祖辈传下的庞大产业。一般而言，开国皇帝意气风发勇猛精进，而继承者能留住先人的辉煌与梦想，就相当不错了。因此，我们无须苛求道光帝晏宁，况且，他是清朝所有皇帝中最为节俭的一位，有“小气鬼”之称。道光怕花钱，尽可能地将一应开销节省到最低限度，有时简直达到了吝啬的地步，与皇帝的身份极为不符。道光规定“宫中岁入不得超过二十万”，“宫中用膳，每日不得超过四碗”。有人戏言，如今规范官场铺张浪费的“四菜一汤”，其始作俑者便是道光皇帝。他“极崇俭德，平常穿湖绉，裤腿膝上穿破一块，不肯再做，命内务府补之”。堂堂皇帝穿补丁裤子，不唯清朝，恐怕在中外所有皇帝中，也算得上极其少见的典型与模范了。只是后来被一批马屁精弄得扭曲走样，他们揣摩“圣意”，上行下效，以穿补丁裤子为荣，普及开来，当时朝中大臣，人人都穿一条打补丁的裤子。本是一件节俭好事，结果以一种滑稽的方式留传于世。

国人心中，当皇帝是天下最美的差事，三宫六院绫罗绸缎山珍海味享不尽的荣华富贵，统驭天下号令一出大地震颤谁敢不从？皇帝，简直就是为所欲为的同义词。因此，国人在潜意识里，都有一份想弄个皇帝当当、玩玩的欲望与念头。其实，皇帝也有皇帝的苦衷，受制于无形的传统、家法、诤谏不说，仅每天上朝听取大臣汇报、批阅公文处理重大事务，这一马拉松似的无休止劳役就够受罪一辈子的了。风光无比的康熙皇帝就曾诉苦似的写道：“皇帝的责任沉重不堪，简直无法规避……臣吏如愿侍奉则侍奉，如愿息止则息止，而为人君者则终生碌碌不已，无处可以休息。”并且有人做过统计，皇帝是所有职业中风险最大的一种，随时都有掉脑袋的可能，善终者的比例微乎其微。这不，道光帝就因国人大量吸食鸦片这一长期无法解决的事情所困扰，弄得他寝食不宁心力交瘁。

自乾隆初年起，吸食鸦片成为一种流行的时尚，使得拖着长辮、迈着

裹脚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趋之若鹜。鸦片，这一源于天朝之外的黑褐色凝结物，犹如吸血魔鬼，只要你染上它吸食成瘾，就会耗尽家财变得萎靡不振形销骨立。因此，早在道光之前的一百多年，即雍正七年（1729年），清廷便颁布了禁烟律令。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朝廷越是严加查禁，百姓越是吸食成风。雍正七年初禁时，西方输入鸦片二百箱。近百年后道光执政之时，也即道光元年（1821年），输入鸦片四千七百七十箱。道光七年（1827年），达到一万零二十五箱。道光十八年（1838年），数字为二万八千三百零七箱！据有关资料统计，全国吸毒人数超过四百万，其中就有政府文官二十万，清军官兵二十万（清军总计八十万）。因鸦片而造成的国民身体素质之低下，精神之衰疲，道德之败坏，到了不忍正视的程度。对一位节俭皇帝来说最为担忧与寒心的，便是白银的大量流失，国库空虚，入不敷出。

事已至此，道光皇帝不得不痛下决心，彻底禁烟！

禁烟禁烟，说说容易，真要彻查严禁，实在难之又难。不然的话，何以禁了一百多年，却越禁越泛滥，越禁越猖獗？道光明白，要想禁烟成功，首先得有一位办事精练、堪当大任的重臣不可。道光虽然才德平庸，可置于深宫的他挑选人才的眼力却半点也不差，一下子就选中了时任湖广总督的大臣林则徐，下旨紧急召见。

林则徐由武昌匆忙启程，12月26日抵京，27日一大早就被召入皇宫，可见道光心情之迫切。在京逗留十三天的日子里，林则徐被召见八次密谈磋商。第四次召见时，道光特地下了一道手谕，给林则徐以少有的恩典——“紫禁城赐骑”。当林则徐骑在饰满彩纓的高头大马上，缓缓进入皇宫之时，这一被称为“国初以来未有之旷典”的殊荣场面，就连道光本人也未曾见过，不由得早早候立殿外，观赏这一由自己亲手导演的稀世奇观。

皇上越是重视，林则徐就越是感到肩头责任的重大。受命临行前夕，林则徐拜访座师沈鼎甫侍郎，面对禁烟任务的艰难、复杂与严峻，师生俩谈至动情之处，不由得“相顾涕下”。林则徐道：“死生，命也；成败，天也。苟利社稷，敢不竭股肱以为门墙辱？”只要有利于国家社稷，他已将个人生死荣辱置之度外。

尽管林则徐意识到了禁烟危难并决心拼尽全力以报效皇帝的知遇之恩，但怎么也没想到，他所面对的再也不是过去隶属于天下范畴之内的所谓蛮夷，而是一种闻所未闻的新型异质文明，一个最早进入世界资本主义

先进文明行列的大不列颠帝国。古老而封闭的中华帝国将由它的禁烟运动而进入一个陌生时代，在血与火的洗礼中以极不情愿的角色与迫不得已的姿态，被纳入世界一体化秩序之中重新定位。这一不可预测的变数谁也没有料到，林则徐本人没有料到，林则徐挚友、学界文坛比肩而立的两颗巨星魏源、龚自珍没有料到，道光皇帝更是不可能预料得到——他对林则徐的要求是既达到禁烟之效，又不可轻启边衅，作为一个吝啬守成的皇帝，稳定压倒一切，他可不愿因此而爆发一场动乱与战争。

清乾隆帝在1757年诏告天下，划定广州十三行为唯一对外贸易口岸，史称“一口通商”。这也是中国通向外部世界的唯一通道，不，根本算不上通道，只是一线又狭又窄的门缝，一个又细又小的洞口而已。即使无孔不入的鸦片，由外进入中国，也只有通过广州十三行这唯一孔洞方可。因此，林则徐禁烟的目的地就是广州，目标就在十三行！

1839年1月8日，林则徐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钦差大臣身份，乘坐十六人抬杠大轿，离京南下。

历经六十二天行程之后，林则徐刚刚抵达目的地，就开始了一场雷厉风行、前所未有的轰轰烈烈的查烟与禁烟运动。他没有像过去那样不痛不痒地从中国人手中收缴鸦片，因为这些中国人充其量不过是些“二道贩子”而已。真正的毒源在于外国商人，是他们不远万里将鸦片运到中国，利用广州十三行这一清廷许可的特殊渠道，不惜一切手段瞒天过海，将罪恶的种子撒向中华大地。于是，林则徐棋高一着地颁布一条新的查禁手谕：责成外国商人呈缴鸦片！于是，就有了直到今日仍令人慷慨激昂、回肠荡气不已的虎门销烟——从英商手中收缴二万多箱，总重量约二百四十万公斤的鸦片被林则徐下令全部销毁。这些鸦片若用现在的四吨载重卡车装运，约需三百辆，足以排成三里长龙。虎门销烟，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反毒禁毒活动，因制造毒品的技术含量与浓缩程度越来越高，估计今后也难有一次性焚毁毒品超过二百四十万公斤的超常纪录了。

然而，虎门销烟触及了英国政府的利益，惹恼了一批素以文明自居的英国议员，更为一直对中国虎视眈眈的好战分子找到了借口。他们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惜践踏人类公正，不惜蒙上永久耻辱，发动一场不齿的以保护鸦片贸易为目的的侵略战争。

人类历史上，胜利女神时常置公平、善良、正义于不顾，将天平的砝码

倾向邪恶一方。鸦片战争即是典型的一例。

这是一场双方都自认为不在话下的战争。清廷不仅沉醉于开国以来的赫赫武功,也陶醉在几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之中。在清廷眼里,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小国岛夷,胆敢与堂堂大清王朝为敌叫板,不是不自量力以卵击石吗?要知道,清朝从东北起家,入关南下,指东打西,无往而不胜,还从未遇过真正对手呢!只是天朝国策,先文后武,先礼后兵,先抚后剿而已。既然文、礼、抚不成,自然只有剿灭一途了。而英人在经过前所未有的工业革命之后,殖民地遍及亚洲、非洲、美洲、大洋洲所有大陆板块,国力之强大,无与伦比,无人敢撻其锋,自称为“日不落帝国”。

清朝陶醉于昔日的成就与荣光之中,所持有的是一种盲目的自傲。而英人所凭恃的,则是现有的实力与资本,其自信建立在科学的分析、调查与了解之上。两个自负的对手,狭路相逢,互不相让,战争,终于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地爆发了。

其实,这根本就不是一场实力对等的战争。曾先后十八次到过中国从事鸦片贸易的商人安德鲁,在致英国政府的一封信中,认为东方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弱的国家,只靠着系统的谎言、妄诞的谰旨、人民的愚昧来维持……对其勇敢地施用武力,可以收到意外的效果”。早在1832年,英国驻广州商员胡夏米就曾率员七十多人乘阿美士德号英轮由澳门出发,以考察商情为名,对广州、厦门、福州、舟山、宁波、上海、威海等地进行过一番军事侦察,对中国沿海所设炮位、守备兵力、武器装备、战船数量等了解得一清二楚,并测量绘制了沿途航道、河道、海湾的详细地图。在上海,他们发现清军使用的武器还是原始的弓箭、大刀与藤牌,虽有少量火枪,但已成为摆设,因为上面全都生锈了。于是,胡夏米不由地轻蔑说道:“只要有五十名意志坚定、训练良好的士兵,或比这个数字更少,就可以彻底消灭比这五百人更多的军队。”他认为只需三个月,就可武力解决中国。另一随行的德国医生兼传教士甲利更是狂妄地说道:“由大小不同的一千艘船只组成的整个中国舰队,都抵御不了一艘战舰。”不幸的是,他们的话在此后的战争中竟多次应验。鸦片战争期间,清军总兵力八十万(八旗二十万,绿营六十万),因兼有警察、内卫、国防三种职能分驻全国,作战时不得不从各地抽调,清廷实际用于作战的部队约十万。侵华英军数最初四千,后增至一万多。可就这约占英军总数十分之一的军队,竟打败了十万清朝

大军，一比十，可见胡夏米所言并非虚妄。而甲利所言之实就更加令人沮丧不已，因为不仅鸦片战争期间中国水师未能击沉一艘敌舰，就是此后建立了近代化海军北洋舰队之后，直至清朝覆亡，也未能击沉哪怕一艘敌人的舰艇。

不论武器，还是素质，清、英两军都不属于同一档次与层面。在英军杀伤力极强的火炮与来复枪面前，清军的大刀、长矛、箭戟及少量土炮、土銃，实则比手无寸铁强不了多少，与赤手搏狼并无二致。清军的武器装备至少落后二百年，而个人素质也乏善可陈。清朝实行募兵制，一旦进入军营就意味着终生服役。于是，老弱病羸常常充斥其间，眷属也随住兵营。官兵不习文化，不事操练，更有不少吸食鸦片、聚场开赌者。而英军全都经过严格而正规的军事训练，是世界上最为强大的近代化虎狼之师。更要命的是，清兵毫无斗志，刚一交战便被闻所未闻的惊天炮声吓得丧魂落魄，不到几个回合就左右观望，稍一受挫则望风而逃。常言道，两强相遇勇者胜。清军远非强者，又与勇敢绝缘，因此，整个鸦片战争期间，清兵要么惨遭屠戮，要么溃不成军。

版图与人口，再也不是衡量国力的主要因素。说到底，这是一场不同文明——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的交锋与较量，也是一场实力悬殊、清军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战争。然而，关于这场战争，却出现了许多直到今天仍未彻底澄清的神话。

1840年6月下旬，英国远征军进抵澳门海口，以6月28日封锁珠江口为标志，鸦片战争正式爆发。然而，英军仅留少量兵力围而不打，他们有意绕开广州，在厦门递交战书，主力长驱北上，进犯闽浙沿海，7月6日攻陷浙江定海，8月中旬抵达天津大沽口外。于是，就有了英军惧怕林则徐之说，认为他在广东采取的布防措施使得英军无隙可乘，不敢轻举妄动。不仅他人这样认为，林则徐自己也持如此看法。当他得知定海失陷的消息之后，并未反省己不如人，而是指责浙江方面没有像广东那样严加防范。其实，英军压根儿就没想过害怕谁的问题，只是其着眼点并非广州。英国外相巴麦尊在致海军部的公函中明确强调，在广东“不必进行任何陆上的军事行动”，“有效的打击应当打到接近首都的地方去”。战争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一种外交手段的延伸。英国政府很清楚，只有直捣京津，让清廷震悚，才能达到他们所要达到的有效目的。英军的作战行动，显然是在执行

巴麦尊的训令。

此后,南下发动广州战役。面对凶猛而凌厉的攻势,清军经过三天保卫战,便以惨败告终,广州城不得不升起求和白旗。对此,英国参战军官麦华生在《在华二年记》中不无得意地叙述道:“这个骄傲的城市,我们在此常被藐视,国旗常被侮辱。它的人口有一百万,军队夸称五万,现在它要在仅占它兵力的十二分之一的人面前受辱。”

铁的事实说明,广州并非固若金汤,在英军的枪炮前它无力防守。然而,关于林则徐不可战胜的神话却因此而越编越圆,越传越远。因为广州之战爆发前,林则徐便以“误国病民,办理不善”的罪名被革职了。道光皇帝曾一再交代不要轻启边衅,林则徐的违逆显然使他大光其火,予以惩处也属意料中事。由此可见,林则徐被道光选为查禁鸦片的钦差大臣之始,就注定难逃厄运了。既要堵住鸦片源头,杜绝鸦片流入内地,又要保持天下安宁不致发生战乱,这是一个近于悖论的两难,任是谁也无法化解。也就难怪林则徐本人,他的座师,还有友人早就为他的前途与命运而深深担忧了。其实,广州之防守,就建立在林则徐任钦差大臣时的准备之上。广州备战期间,林则徐虽被革职,却没有离开广州,一直协助新任统帅布防,且不时建言建策,并得到了有效的采纳。

堂堂天朝竟然败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小岛夷之手,广大民众,包括政府官员、知识分子、普通百姓怎么也接受不了这一严酷的事实。于是,他们将英军北上归于害怕林则徐,将后来广东的战败归于林则徐的革职,将各地战事一败再败归于当地没有林则徐这样的人物。林则徐革职不久,新任闽浙总督颜伯焘及新任浙江巡抚刘韵珂就不顾触犯龙鳞之罪,要求重新启用林则徐以对付英人,理由之一,就是“该夷所畏忌”。此后,广东民众面对英军进犯,在一份檄文中不禁质问道:“汝已称厉害,何以不敢在林公任内攻打广东?”就连鸦片战争结束后撰述的《中西纪事》、《夷氛闻记》、《道光洋艘征抚记》三部史书,也认为最初英军北上,在于林则徐在广东严加防守、无隙可乘之故。

从某种角度而言,道光对林则徐的惩处——革职流放,反而成全了他,成就了一个民族不可战胜的神话。这一神话犹如一柄出鞘的双刃剑,既可坚定民族信念,树立民族自尊,却也遮蔽了有关事实真相,继续维持清廷的妄自尊大,迎合国人的盲目自信。



三元里抗英也是一个滚雪球般不断扩大的神话。在此，我们有必要还事实以真相。

三元里抗英，是一次少有的胜利，也是整个鸦片战争期间一个极其闪光的亮点。这次民众自发的保卫家园战斗之所以取得胜利，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便是天时、地利、人和。天时：大雨淋湿了英军的燧发枪，火药不能发射，使得三元里百姓手中以农具为主的武器上升到与英军武器同等的水平。地利：英军纵深追击不谙地理，被引入全是“烂泥塘”的牛栏冈、唐夏村一带，因迷路而被团团包围。人和：三元里民众为保卫家园奋起抗争，同仇敌忾万众一心，气贯长虹令敌丧胆。即便如此，三元里抗英战绩也并非后来宣传的那样击毙伯麦、毕霞等英军主将，杀敌数十、一百、两百、三百乃至七百四十八人等诸多说法。据英人所述，陆军司令郭富于1841年5月30日晨亲率三个步兵团及部分孟加拉志愿军开进三元里追击乡民，不久突遇大雨，郭富急令撤退。因“天气阴霾，辨识道路并不容易，稻田成为一片汪洋”，于下午4时才撤出数以万计的村民包围圈。撤出后却发现三十七团第三连约六十人失踪，郭富急忙调来两个水兵连前去接应。这两连水兵配备装有雷管机、不怕雨水淋湿的“新洋枪”，他们循着枪声及喊杀声找到“在稻田上排列成正方形”的失踪士兵，用排枪驱散围攻乡民，终于在当晚9时左右将其接应归队。

综合各方面资料，英军伤亡的实际数字为死亡五至七人，受伤在二十三至四十二人之间。尽管如此，三元里抗英在鸦片战争期间所进行的诸多战役中，英军伤亡人数排列第四。没有经过军事训练的普通民众与近代化武装的英军对阵，能获得如此战绩，用于宣传鼓舞士气，唤醒普通百姓的民族爱国热情，自然十分必要，但若夸大其作用，认为只要广泛发动民众，就可取得鸦片战争的最后胜利，便有可能陷入另一种迷误。此后慈禧太后利用义和团运动的彻底失败就是一种明证。三元里抗英第二天，一万多民众乘势包围了英军据守的四方炮台，幸而被广州知府余保纯劝退，不然的话，在威力强大的巨炮与射击准确的来复枪面前，当地民众将遭遇一场残酷的屠杀。

关于鸦片战争的真相，此外还有许多弄虚作假、篡改伪造、刻意掩饰。

每次战役，各地官员、将帅总是无一例外地夸大战绩，有时达到了不着边际的地步，动不动就是歼敌数百数千，击毁击沉敌舰无数。果真如此，

由十六艘海军战舰、四艘武装轮船、二十八艘运输船、五百四十门大炮、一万多官兵组成的英国“东方远征军”恐怕早就在中华大地消失殆尽了，又何来迫不得已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即以广州保卫战为例，1841年5月26日，广州城已被英军重重围困不得不升起白旗，靖逆将军奕山还在给道光皇帝的一道奏折中宣称清军连续三日频频获胜，并击沉英军轮船一艘，焚毁英人三桅兵船一艘。

整个鸦片战争期间，英军伤亡的实际情形是，死于疾病的数字远远大于阵亡。纵观历次战役，英军损失最多的一次是当属镇江之战，计三十九人死亡，一百三十人受伤，三人失踪。尽管如此，英军仅用一天时间，就攻下了镇江。

镇江陷落，清朝第二大都会南京失去屏蔽，贯通南北的大运河被拦腰截断，江南的大量漕米、税银无法运输北上，供给需以大运河为支撑的北京受到了直接威胁。仗打到这个份上，仿佛咽喉被人扼住，获胜的希望实在是太渺茫了。外患既不可去，而汉人乘机造反的内忧更是弄得道光皇帝寝食不宁，只觉得座下的龙椅在一个劲地震颤不已。于是，他不得不发出一声无可奈何的长叹，罢兵求和。

## 二

中国的优越感由来已久。

由远古至西周形成的中原文化与周边诸文化相比，有着明显的优势。几乎与疆域扩充同步，华夏文明不断地向周边地区渗透开来，虽不乏武力要挟，但更多的则是倾心向慕、主动皈依。经过长时期的补充与融合，逐渐形成了以中原文化为主导的华夏文化体系，所谓“东夷、北狄、西戎、南蛮”，纷纷归化，纳入其中。至隋唐时期，中国汉文化圈差不多扩展到了整个东亚地带。

华夏文明一枝独秀地在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中形成，从未遇到过真正有力的强劲对手。东汉时期，虽有自成体系、思辨精深、内容丰盈的印度佛教文化传入中国，与华夏文化各有所长、难分伯仲，可并未对传统文化构成明显的优势甚至威胁，反因交流、吸收、融化佛教文化中的有益成分，使得渐趋僵化、沉寂、式微的本土文化焕发出新的活力与朝气。

几千年无与伦比的灿烂文化既可所向披靡地征服、影响未曾开化的偏远蛮荒之地，也会因过度的自尊自大，造成盲目的自信自负、自我膨胀、目空一切，甚至于陷入无法收拾的境地。

早在西周时期，华夏文明便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礼法制度——畿服制。《尚书·禹贡》具体阐述了“五服”的内容与范围，以王都为中心划分，方圆千里之内名甸服；甸服之外，每五百里为一服，依次为侯服、绥服、要服、荒服。甸服逼近王畿，由天子直接管辖，属文明地带；其余则依地理远近由亲到疏，为半开化、野蛮、夷狄地区。《国语·周语》也有类似记载：“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周礼·夏官》则提出了类似的“九服”或“九畿”说，王畿方圆千里，此外每五百里为一服，计有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蛮服、夷服、镇服、藩服。对五服、九服之地的统治，实行朝贡制。天子直辖区由百姓缴纳赋税；其他地区，则依次规定每次朝贡的期限为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六年，贡品分别为祀物、嬉物、器物、服物、财物、货物等；而那些蛮荒之地，九州之外的番国一世只需入贡一次。先秦典籍中，臣下觐见君主为“朝”，下人给主子献呈物品称“贡”，“朝贡制”逐渐成为天子与诸侯之间的一种隶属关系。此后，五服、九服的具体内容虽有所变更，但朝贡制始终未变，秦汉后成为中原王朝羁縻周边少数民族的一种模式与制度。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国，是位于世界中心的国家，是整个世界唯一的文明世界，中国就是天下，领土疆域、控制范围长期模糊，朝廷为天朝、天廷，最高统治者谓天子、万邦之主。古时中国没有明确的国家、民族、领土概念，只有夷夏之辨、华夷之分，现代意义的国家、民族概念直到1902年左右才开始出现。因此，在古人特别是那些士大夫眼里，华夏就是文明的代名词，夷人则是未开化的野蛮人。处于边境之外的所有民族不是“蛮貊”，就是“夷狄”，一律冠以虫、豸、犬之类的标记，不将他们当作人看待，至少不是和我们中国人一样的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鸦片战争期间，两江总督牛鉴对英人的动物性曾“活灵活现”地描写道：“彼（英人）虽畜类，亦具人形，譬如桀犬狂吠，本不足以论是非，及投以肉食，未尝不摇尾帖服。”不得已而与“蛮夷”交涉时，总认为“犬羊之性”，贪婪狡诈，唯利是图。直到民国初年，湖南名士王闿运批评郭嵩焘即